

特稿

王飞凌

作者王飞凌系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

中国民主季刊

第3卷 第1期

2025年1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抉择世界秩序 之争：中美的 全球大博弈

摘要：本文简述正在进行的“中华博弈”即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全球性大竞争，以及如何获得一个比较更可取的结局。这场非同寻常的国际竞争，势将选择世界领袖、抉择世界秩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法治政体（democratic rule of law）领导下的现行世界政治秩序，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国际关系体系之上；而中国的威权主义一党专制政体（autocratic partocracy）所推动的，是同样可行但明显更不可取的中华秩序式世界帝国秩序。这两种世界秩序优劣明显，是根本性地不相容。在这场决定人类命运与未来的博弈中，美国和西方仍然有胜出的优势，但优越的政治制度从来并非就自动能战胜落后的政治制度。采用一种“遏转”（containment），即遏制阻止与接触转型相结合的战略思维，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在内，可以迅速、和平地赢得中华博弈，使中美竞争转型，从一场挑战、改变世界秩序的零和博弈，转变为非零和乃至正和的正常国际间竞争。¹

引言：从“中华秩序”到“中华博弈”

以一种也许有些不够自谦的方式，我在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关于中国的“三部曲”，即《中华秩序：中原、世界帝国与中国力量的本质》（*The China Order: Centralia, World Empire, an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wer*, 2017年）、《中国记录：评估中华人民共和国》（*The China Record: An Assess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2023年）以及《中华博弈：抉择世界秩序的全球竞争》（*The China Race: Global Competition for Alternative World Orders*, 2024年）。三本书的繁体字中文版和简体字中文版，则分别由台北的八旗出版社和纽约的博登书屋出版。

在《中华秩序》一书中，我试图重新解读中华世界的长时段历史和世界观，

以了解中国的政治传统和思想理念。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治理以及世界秩序的思想观念和传统制度，即所谓“中华秩序”，基于一种以法家权术为核心、以儒家观念做包装的威权主义乃至极权主义政治体制，在历史上由绵延两千年的秦汉政体帝制所体现。中华秩序宣称拥有“天命”，旨在统一和治理整个已知世界或天下（即“苍天之下”），并在超过两千年的时间里，陆续地主宰了整个欧亚大陆的东部，直至十九世纪末。自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一个复辟再生的秦汉政体，但缺乏传统的中华秩序，于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与当前西方的民族国家体系世界秩序的无休止斗争之中。它同时还面临不断变化的、西化的中国社会，不得不为了其政权的生存和安全而挣扎、奋斗。

在随后的《中国纪录》一书中，我尝试评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另类的政治制度和独特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我就其整体效能、效率、力量、可持续性、和可取性进行了一个宏观的全面评估。我的结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制度性低劣，即所谓“次优化”的政治选项：它虽然使政府强大有力，可行但很不可取，既荒谬又真实，对世界有许多实在而且深刻的影响。

在“中国三部曲”的最后一卷《中华博弈》中，我希望在尽力回答了关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后，开始回答“那又怎么样”和“应该怎么做”的战略与政策问题。我试图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已经处于围绕全球权力和领导地位的大竞争之中。北京在这个“中华博弈”中的最低目标是要保障其威权专制政治制度的生存和安全，而其最大目标则是要重新定位世界并重塑世界秩序，使之成为符合其秦汉政体形象的世界帝国。美国，无论它对中国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对中国友好或者不友好，仅仅因其自

身的存在与强盛，就一直都是北京的国际野心的主要障碍；于是，中国共产党独裁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七十多年来，一直必然地与美国为敌；所不同的只有手法、战术与敌对的烈度不一而已，尽管美国几十年来，其实提供了中国的主要的收入和技术，促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富强。

简单介绍了我试图去全面理解和解释中美关系的努力之后，接下来我将聚焦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的这场全球性大博弈，即“中华博弈”，并展示一些如何为世界（包括中国人民）赢得这场竞赛的战略思考与观点。

中美竞赛的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即一场几近零和甚至已经零和（zero-sum）的生死搏斗（existential rivalry），在北京和华盛顿都得到了深刻认知。美国总统拜登在2021年对联合国表示，世界“处在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正面临“一个将真正决定我们未来的十年”。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2023年10月对拜登表示，“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的大变局”，而他们两人的政策选择将“决定人类和地球的未来”。³

为什么美国必须赢得中华博弈？

尽管威权专制政体和统一的世界政府是明显的低劣、不可取，但事实上，它们却更为“自然”而且具有悠久传统。人类政治中的暴政或寡头政治倾向，使得民主法治政体成为一种需要经过长期培养和维持的努力。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也是如此。历史上，世界帝国对许多人来说都一直具有高度的吸引力，包括雄心勃勃的追求权力与控制的独裁者们，和有着崇高理想的为了世界和平与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和平主义者。历史上，各个互相隔离的人类文明“世界”里，只有欧洲-地中海世界成功地避免了世界帝

国秩序逾千年以上；正如历史学家们所观察到的，它逃脱了世界帝国的“罗马统治”。⁴ 最终，欧洲诸国在法理上正式确定了各个主权国家分权、分立的国际关系世界政治秩序，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也就导致了欧亚大陆上的历史性的所谓“东西方大分流”（East-West great divergence），以及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推动了过去几个世纪人类文明的巨大质变。

美国主导的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的现今变体就是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简称 LIO）。像任何人类政治体系一样，自由国际秩序很自然也有一些专横和不合理的成分。但它可能是自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唯一的一次，其主导大国，即美国，几乎不可能将该世界秩序转变为相反的形式——即世界帝国。美国内部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政治结构上实行三权分立与制衡，已经深刻内化了多元主义、多样性与分权、制衡机制。这些都使得基于民主法治的政治体系和三观，在意识形态和法律上保证了美国人民及其精英们对政治集中化以及单一政治权力的反感和警惕，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1961 年，当被问及作为美国总统最自豪的成就时，哈里·杜鲁门回答道：“我们完全击败了敌人，然后将他们重新带回到国际社会。我想认为，只有美国才能做到这一点。”此后，正如基辛格的观察，“所有的杜鲁门的继任者们在几十年里都遵循了这一做法”。⁵

在理想情况下，现有的世界秩序当然可以并应该得到进一步改善和加强。在必要时，缩减甚至更换其领导层完全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保持活力和可持续性的合理选择。其他不同地理、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国家，包括成功改革和重新定向了的中国，当然可以接替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确保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存续和运作；前提是这些新领袖国家要有

合适的内部组织结构与三观（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并且具备同等或更强的能力来保障这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的关键原则无恙。

但是，直到目前，也许除了仍然不太可能实现的“欧洲合众国”之外，没有任何国家在这一方面具备替代美国的可能性，遑论可取性。因此，作为对抗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政治野心的堡垒，而且为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存续和运作，美国的领导地位无疑是最不坏也是最可靠的选择。关于美国堕落、垮台乃至崩溃的各种说法几十年来不绝于耳；但是能够与美国相提并论的世界级大国至今罕有。尽管存在大量对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的怨恨、威胁和挑战，但没有哪一个挑战者足以代替美国为首的西方对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的可信守护，遑论提升、改善现有的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

因此，为了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美国必须在中华博弈中胜出，抵御来自非自由非民主的世界级大国的严峻挑战、来自西方内部极端民粹主义和无法实现的部落主义的广泛威胁，以及来自天真无知或者别有用心的所谓“全球主义”（globalism）的无限挑战。美国应该“保持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并继续领导那最不坏的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⁶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以，但不应该赢得中华博弈

目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最有可能重塑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上的世界秩序的一股力量；它提供了一种可行但次优且不可取的政治替代方案，试图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中国的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政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国政体，根源于传统的中华帝制政体即所谓秦

汉政体；它又用激进的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其实更多的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专制政治）、以及源于东西方的全球主义世界一家的理想（或者说幻想）包装起来。这样一个可行但不可取、复旧但又颇有新包装的前现代（启蒙运动之前）的落后但有力的政体，由于其制度基因和内在逻辑，必然地要挑战民主法治政体领导下的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 / 西方为敌乃至与世界为敌，致力于重新塑造世界秩序，并非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的必然要求，也不是中国人民自然的伟大抱负。作为原本就是反叛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苏联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产儿，中国共产党独裁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其统治集团的专权与私利，从未改变过其外交政策中的核心使命，尽管其言辞多彩且策略灵活。长期以来，北京时常躲在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尊重与保障的“国家主权”后面，与其利用中国人民作为资源武器和人肉盾牌的民粹主义做法完全一致。在没有能够统治整个已知世界之前，中国共产党总会深感不安；它其实一直是非常直白地表达其世界性目标，反映出其深藏的儒法结合的权力崇拜与控制狂热，也体现了其进口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式共产主义口号：即在一个统治者或一个少数人统治集团下，实现人类的政治统一与政权集中，建立一个类似于中华秩序的世界帝国，或者建立一个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的世界统一的共产主义乌托邦。

换句话说，北京的“中国梦”与“世界梦”，就是为了一小群威权统治者们的无限权力、无尽奢侈与自大雄心，要把一个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过了的“中国次优化”变成一个可能笼罩全人类的“世界次优化”；让全人类都过上中国人民那样的生活：受压迫、少自由、落后穷困、停滞不前、艰辛吃苦。

目前的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显然得到全球范围的支持，这可能会削弱北京通过其意识形态的普及来取西方而代之成为新世界霸主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巨大的国内问题，如政治合法性缺失、经济低效、创新不足、人口压力和民众不满，等等。尽管次优化、不可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制政体却是一个强大有力的掠夺性国家，牢牢掌控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从中汲取了不成比例的巨大资源。从根本上说，世界政治秩序大多是由纯粹的暴力塑造的，这种暴力可以强行剥夺并有效地压制民众愿望和理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制体制的巧妙而不择手段的统治方式，使它在国际竞争和征服的游戏中拥有看似矛盾的优越性，尤其是在面对受到各种规则与规范限制、内部与外部都有众多制约的多元化民主国家时。通过集中和聚焦的努力，加上拥有西方技术，但却没有西方制度与价值规范的框架和约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能力获取“有组织暴力的应用优势”，而这种优势正是当年“西方征服世界”过程中，关键的制胜因素之一。⁷

世界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日益全球化，可能加大了中国共产党版本的全球治理取代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可能性。新技术（如人工智能）“最恶劣的用途”可能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更加有效地统治并扩展其权力：“每个公民神经活动的波动[都被及时]输入政府数据库”，利用预测算法“实时识别甚至剿除”异见者，实现极权主义的社会控制。⁸在全球主义的幌子下，“用西方的自由来摧毁自由的西方”，就可能出现一个新的世界帝国；甚至几乎没有什么大规模的战斗的必要，给许多认为现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是核武器）的恐怖已经使得帝国建立变得徒劳且过时的人，带来一个惊人而凄惨的意外。

因此，一个有着坚定目标的自私自利的政治力量，通过其行动和其他所有

人的行动和不作为，可能会为整个世界铺平通向地狱（或天堂，取决于个人立场）的道路，就像两千多年前偏远落后的秦国“出乎意料”地统一了整个已知的东亚世界一样。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像市场经济体系一样，的确潜藏着自己被取代的种子，有许多难免的内耗和走向集权垄断的倾向，最终导致自我毁灭。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了唯一一个有决心且具备足够能力，不择手段地利用各种腐蚀因素和变革力量，来系统性地取代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的大国；其取胜，无论是多么的不可取，无论具有多少悲剧色彩，可能比任何人预想的会更加轻易、更加迅速。

如何博弈：一种关于遏转（遏制与转型）的战略思考

为了节省读者的时间，本文在这里将跳过其实可能很正当的要求，即呈现仔细的分析和充分的证据，简要地提出一种关于中华博弈的“遏转”战略思考。读者当然可以在我已经出版的《中华博弈》一书中详细阅读这些分析与论据。⁹

遏转这一词汇是“遏制阻止”和“接触转型”两个语汇的合成词。首先，遏转思考意在通过有力、有效的持续遏制与坚决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力量及其在国际上的扩张，在与北京的博弈中针锋相对、对等来往，使之无力挑战和改变世界政治，从而维护美国/西方那“最不坏”的国际领导地位和对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来说“最不差”的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同时，遏转思考认为应该也必须通过与中国人民的合适、广泛而真诚的接触，给中国人民赋权、赋能，来帮助促成中国的政治转型；使之无意挑战和改变世界政治。最终将一个转型后现代化的中国，真正完整地融入世界。这个思考，不仅是传统的所谓遏制（containment），更不是单

向的、被滥用的接触 (engagement),¹⁰ 而是两者的有机、有效而更为明智、更为坚定的结合。这一战略性思考, 也许有助于管理和赢得中美之间的全球性博弈, 推进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

遏转概念与“接触遏制”(conengagement 遏制与接触的合成词)相似, 但更为广泛。它意味着一种有意识的战略, 而非权宜之计。它包含两个关键组成部分: 坚决遏制并有效压制中国国家权力, 以及与中国人的聪明接触与充分沟通, 以促进中国国家的转型和将中国作为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的完全成员纳入其中。如果美国主导的西方能够全面而睿智地投入中华博弈, 它完全能够管理并最终获胜; 会比当年赢得美苏冷战更高效、更和平。

遏转旨在中华博弈中实现三个按其重要性降序排列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不可谈判、不容忽视的最高目标: 美国及其盟友必须防止中国共产党重定世界中心、重构世界秩序, 夺取全球领导权。第二个目标是美国应准备应对、威慑但尽可能地避免与中国发生全面战争。第三个目标是西方应正大光明地努力寻求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转型, 真正使中国成为一个具有建设性贡献的伙伴。美国必须确保“北京无论是出于无意还是出于无能, 都无法颠覆地区和全球秩序。”¹¹

为此, 美国及其盟友应该对全球化和世界治理进行全面再思考, 并采取坚决的政策调整。似乎早已时不我待, 应该限制关于全球统一和政治一体化的理想主义但有害的热情。像联合国及其庞大的机构这样的多边组织, 不应被用来破坏建立在各国国家主权之上的国际关系体系。以所谓国际干预权 (RTI) 来执行所谓国际保护责任 (RTP), 在其他主权国家内干预并保护其公民的权利, 应该作为一个富有启迪的理想, 而不是一个法律规范,

仅在极为罕见与例外的情况下予以尝试。那假设和抽象的世界经济的“整体最大”效率，不应凌驾于具体而动态的各个国家的经济效率之上。国际俱乐部中的不受欢迎的成员，一旦被发现并拒绝改变，就不再属于这个俱乐部；如果一个国际俱乐部被劫持并遭操控，那么它必须被放弃、取代。

在平衡秩序、安全与平等的同时促进效率与创新，以确保人类文明的健康与繁荣，各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分权与分立是最后的可靠保障。国家间制度结构上与理念价值上的独立与差异，能够确保持久的国际比较、选择与竞争；而这些比较与竞争则是推动和激励人类文明的一大根本动力。全球平等人权和全球统一生活水平的崇高追求，应该得到最大的尊重，但必须谨慎对待。这些是美好而令人陶醉的理想，就像大同、永久和平和永恒幸福一样，值得人们的所有努力（在成本允许的情况下），但绝不应让它们破坏乃至摧毁那些产生这些理想并使得接近这些理想的最大化成为可能的基本条件，即政治上决定的国际间比较与竞争。

鉴于美国一直是最不威胁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存续的主要大国，美国人因此应理直气壮地通过维持其主导的金融地位、军事优势、教育和创新的卓越以及国内受人尊敬的社会文化与环境条件来强化美国的力量和地位。为了世界的更大利益，应该倡导“让美国第一”，“让美国强大”，“重建更好的美国”和让美国“重新领导世界”的口号，正如 2016 年、2020 年和 2024 年美国总统候选人们都呼吁的那样。这些维护美国的理念应当与孤立主义的短视脱钩，并且不应与任何特定的政治人物挂钩。

要在中美全球性竞争中顺利运行并最终获胜，美国及西方实际上拥有一整套强有力的工具，并且拥有最伟大的盟友即中国人民。通过中国政治体制

的制度性与意识形态转型来最终在中华博弈中获胜，既可取也高效。通过这种方式，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与巨大潜力，将不再被操控与浪费在试图取代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的自戕努力之上，而是真正用于改善所有人的生活，首先是改善中国人民自己的生活。除了捍卫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外，将近五分之一的人类从一个经过验证的不可取、低劣而且压迫性的政权（该政权仅为少数统治精英提供看似最优的服务）中解救出来，本身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成就。理查德·尼克松在1967年提出，西方应与中国接触，旨在“引导中国改变”。¹² 回头来看，尼克松及其团队，以及后续的美国政府，往往忽视了他那明智的建议，且“传统地”在急于寻求北京在解决越南战争和应付莫斯科以及其他许多值得关注或充满希望的目标中那所谓“不可或缺”的帮助时，忽略了与之相伴的促进中国政治体制转型的必要性。1970年代至2010年代西方的政策，通常称为所谓“接触”（engagement）政策，是极不完整、更不彻底，常常被北京定的来往条件牵着走。西方完全可以更好、更自主、更全面、更聪明地接触中国人民，明确地旨在促进中国的社会政治变革。

中国向民主法治方向的社会政治转型，是赢得中美竞争的有高价值而且也有高效的方式。然而，建立中国的民主制度并非西方在中华博弈中获胜的必要或充分条件。即使是在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的自由国际秩序版本下，各国也完全有权选择和试验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促进民主是传播人类已知的最经验证的、最不邪恶的政府形式；但如果以牺牲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为代价，在各国强行推行相同一律的政治制度，这将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可能会导致以单一政治意识形态为名的全球集权政府。与贤哲如康德所设想的不同，世界政治统一成为世界帝国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所谓的“世界民主联邦”；世界帝国无论

其名号和色彩如何，仍然是世界帝国。为了阻止一个中国版本的世界帝国，用另外一个不同版本的世界帝国来替代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仍然会是对所有人的灾难。

因此，中华博弈的胜利不在于美国征服并按其模式来重塑中国，也不在于消除跨太平洋的中美国际竞争。它在于确保各方的竞争是在一个去中心化的世界政治体系中进行，即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中的主权国家之间进行。这可以是高度全球化但仍然各主权国分权分立的自由国际秩序，也可以是各自具有不同内部自由与民主的国家与国家集团之间的竞争与敌对，某些国家还完全可以处于部分断联与闭关孤立的状态。各国通过自助、内部变革、模仿、国际均势（balance of power）政治博弈和利用国际机构，来确保没有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次优化、不可取的国家，能够独自支配整个世界政治并统治其他国家。

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和三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上尤其是外交政策上的有效转型，中华博弈将变成一种全新的国际竞赛；这个新的中美竞争将从为了一个可行但早已过时的世界秩序的替代方案而展开的生死斗争，一场零和或者至少接近零和（zero-sum）的博弈，转变为一个互赢互利的非零和乃至正和（positive-sum）的良性而和平的国际竞争，带来更多的效率和创新，进而丰富和提升人类文明。当然，这样一来，因为中国自己更加现代化而更具创新与效率，可能使得中美之间的国际竞争虽然更具良性但却会更加激烈，令那些不喜欢竞争的垄断者或想要垄断的少数美国人和西方人感到不安与不悦。但是，畏惧竞争既不符合美国利益，也不利于人类文明。公平、良性的竞争是美国文明的精髓之一，也是美国人所极为擅长的；美国和人类一直都是在各种激烈竞争中蓬勃发展至今的，

并将继续在新的中华竞赛中不断出类拔萃。

结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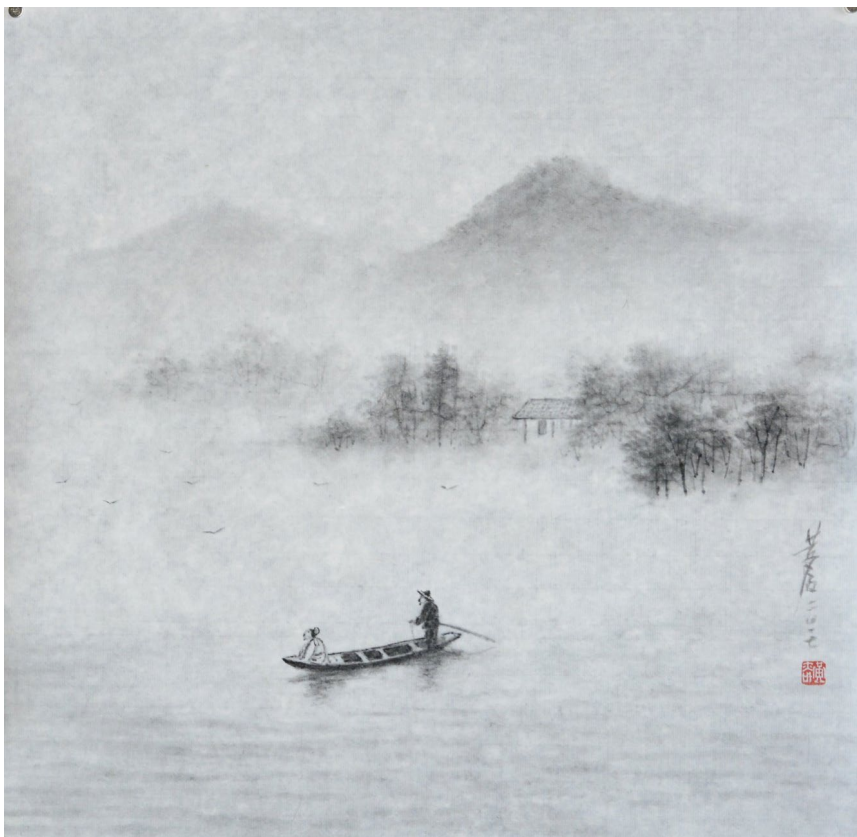
总之，为了确保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和民主法治的国内政治制度，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尽一切可能，随时随地地遏制并削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力量。成功地转型中国的政治治理体系和世界观将是赢得中华博弈的理想方式，并极大地造福于中国人民（除了那极小部分中共专制统治者）。因此，西方应全面接触中国人民，帮助并赋权、赋能他们来推动中国的社会政治转型。但中国的政治社会转型在本质上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业，套用林肯总统的著名词语，中国政治的未来是一个中国人民所有、所治、所享的事业。作为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下的一个主权成员，中国人民有能力也有意志去掌握自己的命运。

150 多年前，传奇的美国外交家与政治家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成为清帝国的驻美公使。他曾在纽约市激情洋溢地演讲道，中国人民是“一个伟大的、高贵的民族 [……] 一个有礼貌的民族；有耐心的民族；清醒的民族；勤劳的民族”，这个民族长期处于暴政之下，被排除在“国际大会议厅”之外。他随后明智地建议，只要中国对外开放，并与各国交往、公平竞争，应该“就让她自我”管理她自己的事务吧。¹³

注释

1 本文的许多内容，来自作者的专著《中华博弈：抉择世界秩序的全球竞争》[*The China Race: Global Competition for Alternative World Orders*(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24)]

- 2 拜登总统在第 76 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联合国总部，美国纽约，2021 年 9 月 21 日。<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9/21/remarks-by-president-biden-before-the-76th-session-of-the-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
-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元峰会晤，新华社，美国旧金山，2021 年 11 月 16 日。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11/16/c_1129977979.htm
- 4 沃尔特·谢德尔，《逃离罗马》（Walter Scheidel, *Escape from Rome: The Failure of Empire and the Road to Prosperity*, Princeton: Princeton, 2019）
- 5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一页。（Henry Kissinger. *World Order*. New York: Penguin, 2014: 1.）
- 6 迈克尔·贝克利，《无与伦比：为什么美国将保持世界唯一超级大国》（Michael Beckley. *Unrivaled: Why America Will Remain the World's Sole Superpow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 7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塑》，第 51 页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2011: 51]
- 8 洛斯·安德逊，“中国的人工智能与专制轴心”（Ross Andersen. “Chinese AI is Creating an Axis of Autocracy.” *Atlantic*, Sept. 2020）
- 9 王飞凌，《中华博弈：抉择世界秩序的全球竞争》（Fei-Ling Wang. *The China Race: Global Competition for Alternative World Orders*, Albany: SUNY Press, 2024）
- 10 王飞凌，“接纳中国——新时代的中国政策”，《华盛顿季刊》21-1, 1998 年第一期，第 67-81 页。（Fei-Ling Wang. “To Incorporate China—A New China Policy for a New Era.” *Washington Quarterly*, 21-1, 1998: 67-81）
- 11 理查德·方泰因，“华盛顿缺失的中国战略”，《外交事务》，2022 年 1 月号（Richard Fontaine. “Washington’s Missing China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Jan. 14, 2022）.
- 12 理查德·尼克松，“越南之后的亚洲”，（Richard Nixon, “Asia after Vietnam.” *Foreign Affairs*, Oct. 1967）
- 13 蒲安臣 1868 年在纽约的演讲（Anson Burlingame. “Speech in New York,” June 23, 1868. <https://china.usc.edu/anson-burlingame-speech-new-york-june-23-1868.>）



黄奕信画作